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可信度的建构与公众认知博弈

苏彦娜

银川科技学院, 宁夏银川, 750000;

摘要:在社交媒体深度融入信息生态的背景下, 新闻传播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传统权威媒体主导的可信度建构机制受到挑战。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使信息生产门槛降低, 算法推荐与社交关系链成为内容分发的核心逻辑, 导致虚假信息、情绪化叙事与认知偏见广泛扩散。在此语境下, 新闻可信度不再仅由专业机构单向赋予, 而是在媒体、平台、用户与社会环境的多重互动中动态生成。本文探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可信度的建构机制, 分析公众在信息甄别中的认知路径与心理动因, 揭示其与媒介内容、技术逻辑及社会信任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发现, 情感认同、群体归属与信息茧房效应深刻影响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 亟需构建技术治理、媒介素养与制度规范协同作用的新型信任生态。

关键词: 社交媒体; 新闻可信度; 公众认知; 信息传播; 算法推荐; 信任建构; 虚假信息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12. 082

引言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打破了专业媒体对信息生产的垄断, 用户既是信息接收者, 也是传播者甚至生产者, 形成了“人人皆媒”的传播格局。然而, 这一变革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真假难辨、情绪压倒事实等问题, 重大公共事件中频繁出现的“反转新闻”与“后真相”现象, 暴露出新闻可信度危机的深层困境。在算法驱动的内容分发机制下, 吸引眼球的信息往往比真实、理性的报道获得更多传播, 公众的认知判断日益受制于情感共鸣与社交认同。因此, 新闻可信度的建构已不再是单一的媒体责任, 而是媒体专业性、平台技术逻辑与公众认知能力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在此背景下, 重新审视可信度的生成机制与公众认知的互动关系, 对于重建数字时代的新闻信任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

1.1 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社交媒体极大地提升了新闻信息的传播效率, 实现了近乎实时的全球扩散。重大事件发生后, 现场目击者可通过微博、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图文或短视频, 无需经过传统媒体的采编与审核流程, 形成“即发即传”的即时传播模式。平台算法对热点内容的自动推荐机制进一步加速了信息的裂变式传播, 一条新闻在几分钟内即可触达百万级用户。这种高速传播打

破了传统新闻“日更”或“时段播报”的节奏, 使公众能够几乎同步了解事态发展。然而, 传播速度的提升也带来了“重时效轻核实”的风险, 未经证实的信息容易迅速扩散, 导致谣言滋生和舆论失焦, 给新闻真实性与社会稳定性带来挑战。

1.2 信息来源多样化

社交媒体时代, 新闻信息来源从传统媒体主导的单一结构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存的开放格局。除了主流新闻机构, 普通公众、自媒体博主、意见领袖(KOL)、非政府组织乃至境外账号均可成为新闻的发布者和传播节点。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 用户生成内容(UGC)往往成为最早的信息源, 补充了专业报道的盲区。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生态丰富了新闻视角, 增强了报道的现场感与多样性。但与此同时, 信息源的泛化也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缺乏事实核查的主观叙述、片面解读甚至刻意伪造的内容混杂其中, 削弱了整体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公众在面对多重信源时, 难以有效甄别权威性与真实性, 增加了认知负担与误判风险。

1.3 受众参与度高

社交媒体赋予受众前所未有的参与能力, 使其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传播参与者。用户可通过点赞、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等方式深度介入新闻传播过程, 形成“互动式传播”生态。一条新闻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本身, 更受用户互动行为的驱动——高评论量和争议性话题往往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此外,

公众还可通过话题标签（如#热搜#）推动特定事件进入公共视野，实现“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这种高参与度增强了新闻的社会动员力，促进了公共讨论。但同时也易导致情绪化表达、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等问题，理性对话空间被压缩，新闻的真实性判断常被情感认同和立场站队所取代。

2 新闻可信度的建构

2.1 新闻内容真实性的判断

新闻可信度的核心在于内容的真实性，即信息是否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事实。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公众判断新闻真实性主要依赖内容本身的逻辑性、细节丰富度与证据支持程度。例如，包含具体时间、地点、人物、现场图片或视频的信息往往被视为更具可信度。然而，随着深度伪造（Deepfake）、图像篡改等技术的普及，视觉证据也可能被伪造，增加了甄别难度。此外，情绪化语言、夸张标题和选择性叙事虽能增强传播力，却可能扭曲事实本质。公众常通过交叉验证——比对多个信源、查找原始出处——来判断内容真伪，但受限于信息茧房和认知惰性，这一过程并不总能有效执行。因此，提升内容真实性不仅依赖媒体自律，也需技术手段（如数字水印、溯源系统）与公众媒介素养的协同支持。

2.2 新闻来源的可信度评估

新闻来源是公众评估可信度的重要依据。传统上，主流媒体、官方机构和专业新闻组织因其采编规范与事实核查机制而被视为高可信度信源。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化，公众需在专业媒体、自媒体、个人账号之间进行判断。用户倾向于信任与其价值观一致或社交圈频繁转发的账号，形成“关系型信任”而非“制度型信任”。这种评估方式易受群体认同和回音室效应影响，导致对非主流但真实的信息视而不见，或对熟悉来源的虚假信息盲目采信。平台虽尝试通过“蓝V认证”“信源标签”等方式标识权威性，但认证机制不统一、虚假认证等问题仍存。因此，建立透明、可验证的信源评估体系，成为提升新闻可信度的关键环节。

2.3 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素养

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新闻内容的质量与公信力。在传统媒体中，记者需遵循新闻伦理，具备事实核查、平衡报道、避免偏见等专业能力。然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大量非专业传播者参与新闻生产，缺

乏必要的新闻训练与责任意识，容易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或掺杂主观情绪。即便是一些自媒体或“网络记者”，也常以流量为导向，采用断章取义、标题党等方式吸引关注，损害新闻的客观性。相比之下，具备专业素养的传播者能够清晰标注信息来源、区分事实与观点、及时更正错误，从而赢得公众信任。因此，在多元传播生态中，应加强对内容生产者的专业引导，推动建立行业规范与自律机制，同时通过算法激励优质内容，提升整体信息生态的可信度。

3 公众认知博弈的表现

3.1 信息过载与选择困境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公众每日面临海量新闻信息的冲击，形成严重的信息过载。各类平台持续推送热点事件、观点评论与短视频内容，用户难以在有限注意力下完成有效筛选。面对数量庞大且观点多元的信息源，公众常陷入“选择困境”：既担心遗漏重要资讯，又难以判断何为真实、权威的内容。这种认知负担导致“浅阅读”和“情绪优先”的信息处理模式盛行，用户更倾向于依赖标题、封面图或社交推荐来快速决策，而非深入核实。同时，算法推荐机制加剧了信息冗余，重复、相似或冲突的内容反复出现，进一步扰乱判断。长此以往，公众对新闻的信任感下降，出现“信息倦怠”甚至“反媒体情绪”，削弱了理性公共讨论的基础。

3.2 情绪化传播对公众认知的影响

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传播 increasingly 被情绪驱动，情感共鸣往往比事实本身更具传播力。带有愤怒、恐惧、同情或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更容易引发点赞、评论与转发，形成“情绪溢价”。这种情绪化传播深刻影响公众的认知判断：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与自身情绪状态或价值立场相符的信息，而忽视客观证据。例如，在突发事件中，一条煽情但未经证实的短视频可能迅速引爆舆论，而后续的澄清报道却难以获得同等关注。此外，“后真相”语境下，情感成为构建“主观真实”的核心，公众将“感受上的真实”等同于“事实上的真实”。这种认知偏差导致群体极化、对立加剧，理性对话空间被压缩，新闻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在情绪洪流中被不断消解。

3.3 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

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要由专业新闻机构主导，决定“公众谈论什么”。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平台算法

成为新的“隐形议程设置者”。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分析，算法自动识别热点内容并优先推荐，决定了哪些新闻进入大众视野、哪些被边缘化。例如，微博热搜榜、抖音热榜等榜单实质上是算法与商业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反映公众兴趣，也主动塑造公众关注。这种技术驱动的议程设置具有隐蔽性和操控性：某些重要但缺乏流量的议题可能被忽略，而娱乐化、争议性话题则被放大。此外，平台的商业利益、审核规则与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影响内容可见性。公众在不知情中被引导关注特定议题，其认知框架和判断标准潜移默化地被平台逻辑所塑造，形成“被安排的公共讨论”。

4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可信度建构与公众认知博弈的关系

4.1 新闻可信度对公众认知博弈的影响

新闻可信度是公众进行认知判断的重要锚点，直接影响其在信息博弈中的立场选择与行为取向。高可信度的新闻内容能够稳定公众预期，引导理性讨论，减少谣言传播与群体极化。当权威媒体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时，有助于在舆论混乱初期建立共识，遏制虚假叙事的扩散。相反，若新闻内容存在失实、偏颇或滞后，公众将对其产生怀疑，转而依赖社交圈层、情感认同或阴谋论来解释事件，加剧认知分歧。尤其在重大公共危机中，可信信息的缺位或失信会引发“信任塌方”，导致公众在多元信源间反复摇摆，陷入认知混乱。因此，新闻可信度不仅关乎媒体公信力，更是维系社会共识、引导公众认知走向的关键力量。

4.2 公众认知博弈对新闻可信度建构的挑战

公众在社交媒体中的认知博弈反过来对新闻可信度的建构构成严峻挑战。由于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和算法推荐的强化，公众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排斥异质观点，形成“认知闭环”。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新闻内容真实客观，若与受众既有信念冲突，也易被质疑、抵制甚至污名化为“假新闻”。此外，情绪化表达和群体认同常凌驾于事实核查之上，导致“真相让位于立场”。公众的质疑态度虽有助于监督媒体，但过度怀疑或泛化不信任则会削弱整个新闻系统的合法性。这种自下而上的认知反制，使新闻可信度不再由专业权威单方面确立，而必须在与公众的持续互动与协商中艰难建构。

4.3 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

新闻可信度与公众认知博弈之间存在动态、双向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新闻可信度作为“输入变量”影响公众的信息筛选、信任判断与态度形成；另一方面，公众的反馈行为（如转发、评论、质疑）通过数据反馈给平台算法，反向影响新闻的传播范围与可见性，进而重塑可信度的生成环境。这一过程形成“建构—反馈—再建构”的循环机制：媒体发布内容→公众基于认知框架进行解读与传播→平台根据互动数据调整推荐权重→高传播内容被误读为“更可信”→进一步影响公众认知。在此闭环中，技术逻辑、社会心理与专业实践交织作用，使得可信度不再是静态属性，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协商、争夺与重构的社会认知结果。

5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可信度建构的策略

5.1 提高新闻内容真实性

提升新闻内容的真实性是重建公众信任的根本路径。媒体机构应强化事实核查机制，建立从信源验证、交叉比对到多信源印证的标准化流程，尤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坚持“快而不虚”。可引入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技术为图文视频内容提供溯源凭证，增强信息可验证性。同时，鼓励发布“透明化报道”，主动说明信息来源、采集过程及可能存在的确定性，提升报道的开放性与可信度。对于已发布的错误信息，应及时更正并公开说明，体现责任担当。此外，推动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合作，优先推送经过核实的权威内容，在信息洪流中树立“真实标杆”，引导公众形成以事实为基础的认知习惯。

5.2 增强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素养

在多元传播主体并存的环境下，提升各类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素养至关重要。传统媒体记者需坚守新闻伦理，坚持客观、平衡、公正的报道原则，避免迎合流量而牺牲真实性。对于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媒体、公民记者和意见领袖，应加强新闻基础知识培训，普及事实核查方法与版权规范，倡导“负责任传播”。教育机构可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培养未来传播者的批判性思维与社会责任。平台方面，可通过认证体系、流量激励等方式鼓励专业内容生产，对具备新闻资质的账号给予标识与推荐支持。唯有提升整体传播群体的专业水平，才能从源头上减少 m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的生成，构建健康的信息生态。

5.3 完善社交媒体平台监管机制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应在新闻可信度建构中承担更大责任。平台应优化算法推荐逻辑，降低煽动性、情绪化内容的权重，优先推送经核实、来源清晰的新闻信息。建立多层次的内容审核与标注系统，对疑似虚假信息添加“争议提示”或“事实核查标签”，引导用户理性判断。与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合作，构建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置重大谣言。同时，提高算法透明度，向公众说明内容排序与推荐规则，接受社会监督。政府层面应出台针对性法规，明确平台在信息治理中的义务，推动建立跨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通过技术、制度与协作的多重保障，打造更加清朗、可信的数字公共空间。

6 结论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可信度的建构已不再局限于媒体机构的单向输出，而是在技术平台、传播者与公众认知的复杂博弈中动态生成。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多来源与高参与特征，在提升舆论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虚假信息扩散与公众认知分化。新闻真实性、来源权威性与

传播者专业性仍是可信度的核心支柱，但其效力深受算法逻辑、情绪传播与群体认同的挑战。唯有通过提升内容真实性、强化传播者素养、完善平台监管与推动公众媒介教育多方协同，才能构建可持续的新闻信任生态。未来，需在技术效率与公共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重建以事实为基础的理性对话空间，维护数字时代新闻业的社会公信力与公共功能。

参考文献

- [1] 卢超峰.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可信度危机及其应对策略[J]. 新闻文化建设, 2025, (05): 70-72. DOI: 10.20253/j.cnki.cn10-1677/g.2025.05.011.
- [2] 刘岩, 尹连根. 社交媒体用户新闻回避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J]. 学术探索, 2024, (07): 54-66.
- [3] 林萍. 媒介可信度视角下社交媒体中的假新闻识别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 DOI: 10.27316/d.cnki.gswyu.2021.001459.

作者简介：苏彦娜（1992.1）女，回族，宁夏，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新闻学，传播学。